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朝鲜文学的文化观照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Korean Literature

李岩 著



商務印書館

湛江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新视野学术文丛

新诗创作 十五讲

殷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文学的文化观照/李岩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0-11085-3

I. ①朝…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研究—朝鲜
IV. ①I312.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17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朝鲜文学的文化观照

李岩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085-3

2015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1/2

定价: 5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如同母子，血脉相通，根茎相连，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自然关系。二者的这种自然关系告诉我们，研究一个国家、民族文学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其中内在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某种历史文化是其文学不可离异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土壤，是其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营养之源。具体到朝鲜古代文学，它无疑以其历史文化为土壤，每一步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历史文化的滋养，它的每一个细胞中都渗透着其文化要素的观照。

朝鲜文学是朝鲜自身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从地理上讲，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北与中国东北地区相连，南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西和中国山东半岛分处渤海南北两岸，是自古天然地环抱于中国、俄罗斯、日本等东北亚诸国的半岛国家。朝鲜民族自古居住在这样一个半岛环境中，享有海运之便，商业文明起步较早，与外界的人员往来频繁。再由于半岛南北狭长，山多平地少，自身内地的回旋余地小，农业经济发展空间有限，所以历史上的朝鲜居民在文化上努力向外拓展。这样的自然环境，使朝鲜半岛上居民的文化心理较为外向，文化系统经常处于一种活跃和开放的状态。

在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历代的思想与文化。一直走在古代世界前面的华夏民族，始终把自己的文化及价值规范视作普世的唯一文明形态。在古代华夏人眼里，自己生活在天下九州分野之内，而其边缘则生活着“夷狄”；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区域称作“中国”，而将“夷狄”所生活的边缘地区叫作“蛮荒之地”。自古以来的华夏人，因自己的先进文化“光被天下”而自豪，并不断以自己先进的制度、典章、文物、思想、习俗和生产技术教化“夷狄”；而尚未开化的周边民族或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四邻诸国，也都愿意接受中原的“礼乐教化”，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所说的“以夏变夷”。在这样的“天下”思想和“华夷”观念下，华夏民族对自己周边的“夷狄”，根据其具体的文明程度，则采取不同的态度。

朝鲜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其文化不仅起步很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创造了自己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朝鲜很早就被称为“君子国”,孔子曾遇人生坎坷,说道不行欲去居之。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发展与新罗的外交关系,盛赞其君子国之美风,常派使臣“嘉赏安慰之”。后来,统一新罗二百五十余年、高丽王朝四百八十年和李氏王朝五百年中,尽管经历了多次战火和内部乱离,但朝鲜还是一步步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封建国家阶段,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封建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古代的汉文学和国语文学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就,成为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朝鲜人一向以极其发达的汉文学而骄傲。它的上档次的汉文学,一次次被中国正统文人所印证和认可。到了宋、元、明、清,中朝两国关系越来越近,相互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几乎所有以使节身份去过朝鲜的中国文人,无不为其文化之发达、汉文学之娴熟、唱酬能力之高超所折服。自从它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汉文学特别是汉诗水平日益提高,到了高丽后半期迎来了朝鲜汉文学新的繁荣期。朝鲜社会发展到李氏王朝中叶,封建文化又迎来新的高峰,可以说这时期“声名文物粲然大备”,贤俊续出,名著不断。在文学上,这时期前后也出现了名家辈现、名作连绵的局面。

应该知道,文学是相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体现相应文化的一个窗口。作为审美文化的一个方面,文学有着自己一系列的特性,但它永远也无法离开自己的母体——生养自己的相应文化。我们所谓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艺术。一定的文学,是一定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借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内心情感和反映具体社会生活的文化的审美介质。朝鲜古代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不仅是其古代作家对客观世界形象反映的产物,也是朝鲜古代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除了朝鲜正统的汉文学和国语文学之外,还有一种光芒四射的文学样式,那就是它的口传文学。它的神话、传说、民歌、故事、歌谣、盘索里等民间文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千百年来,以其动人的审美情趣感化了后人。口传文学无疑是朝鲜文学发展的母亲,也是朝鲜文化的诸多要素沉淀得最为深刻的艺术领域。如果说朝鲜古代作家把文学当作“美、刺、劝、惩”之工具,关注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有感而发,时刻讲求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那么它的民间文学则多从原始信仰、民间宗教演绎而出,即使是它的歌谣、戏曲、故事之类,也表现出“感物而发”、“率性而为”、顺应自然的里巷特性和伸张正义、主持道义的文化心理。特别是他们“敬天事鬼”、与自然和谐统一、注重人间冷暖的务实精神,是与其养育万物的农业生产环境分不开的。

朝鲜民族的文学与其文化如此水乳交融,它们的表现形态又是如此千

变万化、深厚隐秘，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余地和探索空间。对其艺术魅力之赏析难以穷尽，难以用文字尽情展现，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意义者，借以探寻其文学的文化观照，并从中展示其民族文化及文学创作之间的血脉关系。

在一本书中，讨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抱残守缺，犹豫不前。本书想通过一系列实际例证，揭示朝鲜文学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意蕴，从而展现其中所包含的朝鲜文化与文学之关系。

如果在本书中，能够实现这一学术目标，便是实现了作者多年的愿望。但愿这本书所勾勒的朝鲜古代文化与文学关系，能够给学术界以某些启示，给关心朝鲜文学的年轻人以一定的帮助，作者就足够欣慰了。

李 岩

2014年9月于北京自宅

目 录

第一章 朝鲜上古原始信仰与文学	1
第一节 上古的人文之初与审美意识的萌生	1
第二节 上古神话的原始文化意蕴	6
第三节 上古巫术信仰与歌舞之俗	17
第四节 原始文艺中的言灵信仰	31
第二章 朝鲜古代思想文化寻根与文学	37
第一节 古代名谣《箜篌引》存疑续考	37
第二节 朝鲜早期文明和史书	43
第三节 三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与佛教的本土化历程	57
第四节 朝鲜传说与文化中的“处容”考	65
第三章 封建文明的高扬与高丽汉文学	84
第一节 高丽前期文学和汉文化发展之历程	84
第二节 高丽前期歌功颂德之诗风	98
第三节 科举文化与文人林椿的布衣人生	111
第四节 李奎报《东明王篇》的审美特色	123
第五节 李奎报诗歌之创作历程及其艺术风格	133
第六节 李奎报诗歌之思想和艺术特点	144
第七节 高丽朝科举制度的实施对其社会文化走向的影响	158
第四章 元代中朝文化交流与小说《西游记》祖本在高丽	166
第一节 《西游记》元代祖本形态新考	166
第二节 《朴通事谚解》中的西游故事	173
第三节 高丽敬天寺塔壁画中的西游故事	174
第五章 高丽汉语课本《朴通事》中的元代《西游记》	182
第一节 《朴通事集览》的学术价值	182
第二节 高丽《朴通事》之编写年代考	184
第三节 《朴通事集览》是验证《朴通事》内容的最可靠注释本	189

第四节 《朴通事集览》证实高丽本《朴通事》是“车迟国斗圣” 故事早期记录者·····	192
第五节 《朴通事集览》能够证明元代已经有小说 《西游记》祖本存在·····	201
第六章 李朝尊周意识与使节文学·····	207
第一节 朝鲜朝前半期对明事大政策之思想内因·····	207
第二节 朝鲜 17 世纪“北伐论”思想及其社会思想文化基础·····	215
第三节 朝鲜古代中国观的形成与事大思想·····	222
第四节 从《朝天录》看明清时期朝鲜文人中国观的演变·····	235
第七章 清鲜文化交流中的诗文主题与艺术例言·····	246
第一节 《朝天录》与李晔光的“朝天”诗·····	246
第二节 燕岩《热河日记》北学思想中的实业文化内涵·····	250
第三节 燕岩《书李邦益事》所涉台、澎、闽游历考·····	259
第四节 简论朴趾源写景散文的艺术特色·····	277
第八章 李朝国语文学中的《杜诗谚解》·····	283
第一节 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283
第二节 杜诗在高丽文学发展中的影响·····	287
第三节 朝鲜朝对《杜工部集》谚解工作的展开·····	294
第九章 近代转型与梁启超对朝鲜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305
第一节 朝鲜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初探·····	305
第二节 日本吞并朝鲜始末与梁启超·····	310
第三节 梁启超文艺观的东渐和朝鲜题材诗歌·····	315
第四节 梁启超组诗《朝鲜哀词》所揭露的“韩日合邦”阴谋·····	321
第五节 梁启超思想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影响·····	332
第六节 梁启超“功利”的小说观念对朝鲜新小说发展之影响·····	338
参考文献·····	345

第一章 朝鲜上古原始信仰与文学

第一节 上古的人文之初与审美意识的萌生

一、上古文明与宗教观念

环境造就时世,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不同的时代、风土、社会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审美文化,并使其具有独特而鲜明的特色。朝鲜古代的审美文化,就是在朝鲜特殊的风土和历史条件下孕育和成长起来的。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它隔着日本海、黄海、朝鲜海峡,分别与日本列岛、中国的燕赵大地、山东半岛和苏浙沿岸一带相望,北部一侧则与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毗连。其与周边既阻隔又便于沟通和交流的地理特性,决定了它历史、文化的走向和特质。据考古发现,朝鲜半岛自约六十万年前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前期,后来经过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公元前七千年至公元前六千年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从被认为是其居住地的洞穴或半洞穴中出土的炉址、打制石器、骨角器、石制雕刻品、动物化石等,都说明朝鲜人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开始懂得使用火、制造工具等服务于原始生活,以雕刻、原始歌吟、有一定节奏的舞蹈等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诉求。朝鲜的新石器时代也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在文化上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据考古界的分析,前期主要以圆底无纹土器和平底隆起纹土器为主,中期主要以工艺上更为复杂的栉纹土器为主,后期则主要以波状纹土器、雷纹土器为主。朝鲜新石器时代的人主要采取洞穴式、岩阴式、竖穴式和土幕式的住居方式,以血缘为单位逐步形成村落;后来由村落形成部族社会,由部族社会发展成部族联盟体社会,各个阶段都选举产生氏族长、部族长和部族联盟长;一般情况下都采取议事制。后来朝鲜阶级社会中实施的和自制度及公厅、

都厅、茅亭制度都根源于其原始社会。朝鲜新石器时代中期已进入农耕社会,各个部族和部落都在自己一定的区域内进行渔捞、狩猎和农耕活动,劳动所得共同分配,有事则共同议事解决。

朝鲜新石器时代人的思考方式或思维构造,基本被宗教意识支配。在他们那里,宗教是对人的生命、生活、生死的精神关注,而这种精神关注则来自于现实,也“适用”于现实。在不能正确理解大自然的力量和变化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大自然有善恶两面的面孔,诸如太阳神之类的善神给人类带来幸福,生活于阴间的诸如恶鬼之类,带给人们的是不幸。从而在朝鲜先人那里出现了认为能够避退恶鬼、迎接善神致福的咒述师,古朝鲜的檀君、韩的天君、新罗的滋充(次次雄)等就充当了这个咒述师的作用。在政治和宗教尚未分开的上古时代,人群中的这些头面人物都既是部落或部落共同体酋长,又是祭祀等宗教活动的主持人。后来在朝鲜半岛存续了几千年的巫祝仪式、宫廷或民间女巫男觐们的降神活动,以及人们头脑里的信仰观念,其根须无不在这上古的咒述传统。

古代朝鲜人信仰和崇拜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人的神秘力量、神秘主宰,左右着人和人间社会的一切。他们甚至认为自然界的某些动、植物或物象,与自己的部族有因缘关系,或认为与自己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某种因果关系,于是他们精神上所认定的某些客观对象一一都成为了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对图腾的崇拜和信仰,就是朝鲜古代先民早期的崇拜和信仰形态之一。古朝鲜人的熊图腾、东濊人的虎图腾、扶馀人的蛙图腾、三韩各个部族国家的马图腾、鸡图腾、鹊图腾等就是朝鲜上古时期各地各个部族的代表性图腾,它们雄辩地告诉我们朝鲜上古时期各地各个部族或国家的人们的宗教意识和文化观念。

古代朝鲜人还传承着万物有灵论的意识观念,认为世间万物无不具有灵性,具有某种类人的灵气,从而也演绎出许多精灵信仰的故事。古代朝鲜人认为人虽死,灵魂不灭,人死后其灵魂游荡于墓室和人间世界之间,依旧关照着家人和世事。所以他们格外重视人死后的葬礼,认为葬礼事关对死者的安慰和活着的人们的幸福。据考古发现,在朝鲜半岛发掘的诸多古墓中,安葬死者大都采取东枕伸展仰卧葬型,附葬石簇、土器等物,以供死者在黄泉使用。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位,古代朝鲜人的这种葬俗,正好反映着他们灵魂不灭的思想和太阳神崇拜信仰。作为三面环海的半岛国家,朝鲜人一向崇奉多神信仰,从天上的太阳神、七星神,到地上的地神、山神、五谷神等,再到河神、海神、湖神,凡是与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物和事物都纳入了宗教的关照。对上帝、天神的信仰,在朝鲜半岛则更是普遍的信仰形

态。人们认为上天有意志,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地上人间的一切事情;认为鬼神可怖,但天神则更为全知全能,不能不绝对尊奉。上帝和天神,是万般神灵之中的至上神,是统治一切神、仙、灵、怪的主宰者。

各种迹象表明,到了新石器时代,朝鲜古人的审美意识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时期的朝鲜古人,在其初、中、晚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打制石器、骨角器和无纹土器并存的时期、栉纹土器时期和波状、雷纹土器的时期。生产、生活工具的这种演变,体现着他们的大脑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过程,也体现出他们审美意识的积极转化过程。这时期栉纹土器的线形纹样,已经表达出朝鲜古人工艺制作上的一种新的进步,其波状纹土器的曲线,进一步趋向复杂化,而其雷纹土器的纹样,则更为婀娜可亲,工艺技巧上也表现出一定的成熟度。从无纹土器到栉纹、雷纹土器的过渡和发展,蕴含着朝鲜古人的观念从纯实用性到实用性和装饰兼顾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同时蕴含着朝鲜古人审美意识变化发展的内在脉络,也体现着他们祈愿辟邪、生殖安全、生产丰收等的咒述信仰的宗教意味,从而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文化体系。

古巫的产生,意味着一系列咒述活动的进行。而这种宗教性活动,往往包括巫祝、祭祀活动所必需的一系列的原始性歌唱、动作和工具(诸如能够敲打的鼓类、摇晃发声的铃铛类等)的陪伴。一开始只为实用的这些东西,无疑成为了后世音乐、舞蹈和诗歌产生和发展的母体。不管这些宗教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农耕渔猎还是医病求福,其过程无疑都带有古代宗教的虔诚与狂热,意欲感动天神与地鬼,以达到人类本身实际生活上的目的。这种以媚神为目的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已构成古代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基调。在新石器时代的朝鲜人那里,除了这些以宗教活动为媒介的审美文化之外,也曾经有过纯粹以审美鉴赏为目的的艺术活动,如迄今发现的人形或动物形雕刻、古贝冢中出土的人脸形玩具等,都是其明证。

二、物质文明中的审美意识

自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间开始使用的青铜器,把朝鲜古代社会文明推进了一大步。由于文献资料的湮没和考古发掘的欠缺,对朝鲜半岛的青铜器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这个问题,很难做出明确的结论。从朝鲜半岛出土的琵琶形铜剑、多钮粗纹镜、多钮细纹镜等青铜器的形态来看,其形制与现今中国东北松花江、辽河流域出土的同类文物的形制基本类似,这可能预示着古代这一地区的文化有互相交流和沟通。但是同样在朝鲜半岛各地发掘的青铜戈、青铜铎、青铜铎等,只见于朝鲜半岛各地,这可能说明当

时朝鲜半岛的青铜器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发展阶段。青铜器的运用大大促进了朝鲜半岛的农业生产和其他领域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再分配的细化,从而也促进了社会阶级分化。近、现代以后在朝鲜半岛各地大量发现的支石墓、石棺墓、积石冢等,充分证明青铜器时代朝鲜半岛阶级分化加剧的历史。这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以维持原有氏族集团为前提,结成以地缘为中心的新的共同体,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以各个部族为基本单位而结成的部族联盟。在这样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下,很自然地产生了大小族长之间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及这些支配阶层和被支配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越到后来越被强化,最终成为了部族联盟权力分配的基本根据。在朝鲜半岛文化学领域中,将这些支石墓称为太阳崇拜形巨石文化。这些支石墓的巨形盖石,其重量一般达60—70吨,如果当时没有可动员的众多人力和物力的实力,无法构建这么庞大的墓葬。这些支石墓往往形成群落的形态,少者三四座,多者达一百多座,说明一个部族联盟的最高权力以世袭的方式传下来,代代相传。青铜器的运用不仅加剧了阶级分化,而且也加剧了人群的贫富差异,继而也加速了部族联盟之间相互的征服战争。从征服战争中获得的俘虏,逐渐转为奴隶,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阶级分化,社会越发演变成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新的国家体制系列。

从宗教的角度看,这种支石墓体现着朝鲜古代祭祀观念形态新的变化和发展。它意味着古代祭祀观念,已越过过去崇拜自然神的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崇拜祖先神的古坟文化时代。从当时的支石墓、石棺墓、积石冢等墓葬形制来看,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崇拜祖先这种观念和习俗已经非常流行,已足以代表那个时代宗教信仰的主流。这种王权继承的原初仪式和表达,成为其后接受儒家礼仪思想的本土思想文化的基础,成为构建祖先宗庙以建立秩序体系的理论根据。所以朝鲜古坟文化时代的这种支石墓,不仅代表着身份的高低、贫富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当时社会新形势下的政治关系、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文习俗。细考朝鲜上古时期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发展足迹,我们不难发现朝鲜古人的审美意识和原始文艺形态,是与宗教仪式一起胚胎、共同发育的。同样,朝鲜古人的审美观念及其原始艺术,往往与实用性的功利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有些时候也显示出实用与纯粹审美欣赏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情况。

如果说从无纹土器发展到细纹土器,是朝鲜古人思维能力的一大飞跃,那么其后创造出来的波状土器、雷纹土器,是其艺术想象力的又一次突破。它那一条条细纹、波状和雷纹状线条中,不仅记录着他们审美意识和艺术想象的一次次的进步,也记录着他们早期的艺术感动和艺术创造力的足迹。

他们的这种艺术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生活、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其艺术思维不断进步的结果。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对朝鲜先人来说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不仅大大改善了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也大大开启了朝鲜先人原来有限的艺术想象力。琵琶形铜剑、多钮粗纹镜、多钮细纹镜、青铜戈、青铜铎、青铜铙等,既是非常时期的战斗武器,又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从工艺或艺术的角度,它们又是可欣赏的艺术品。琵琶形状的青铜剑,粗细纹铸成的多钮青铜镜,以简洁秀逸的风格制造的各种青铜戈、铎、铙等,既质朴又美观,都是实用和观赏完美结合的产物,充满了跃动的时代气息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想象力,具有那个新时代新的审美价值。朝鲜青铜器时代的这些工艺乃至艺术成就,直接启发了其后铁器时代工艺的和艺术的创造。

在这样的过程中,祭、政逐渐分离,社会权力和经济分配得到重新调整,政治出现了在比原先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的局面。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相同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为特征的朝鲜(韩)民族,逐渐在东北亚一隅的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中形成。他们曾经被中国及其周边民族称作貊、秽貊、韩、东夷等,作为满一通古斯族的一个系统,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它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其能量辐射到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周边国家和地区。青铜器时代后期,朝鲜历史上最早的部族联盟体国家——古朝鲜业已成立。研究发现,古朝鲜之所以能够最早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得益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靠近中国东北一方,而且其本身也努力学习中国的先进制度和文明,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朝鲜步入了铁器文化时代。这一新的文化形态,主要来自于中国各地;古代朝鲜从而逐渐开始进入了中国汉文化圈范围之内。中国战国时期混乱的内部纷争,匈奴的频繁入侵,使得中国燕、赵、齐地区的汉族人口不断地流入古代朝鲜各地;特别是秦、汉之际,各地农民起义和军阀势力蜂起,大量流移民为躲避战争而带着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进入朝鲜,朝鲜的生产力由此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先进的铁器文化不断东渐,使得这个东北亚一隅的半岛国家迅速崛起。朝鲜的铁器时代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公元1世纪之前称为前铁器时代,而公元1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称为后铁器时代。由于铁器的大量普及,过去的氏族共同体迅速解体,新的亲族共同体逐步建立,其中各种力量较为强大者掌握大权,统治整个集团。这就是后来称作部族国家的统治集团,北方的扶馀、沃沮、东濊、高句丽,南方的三韩、伽耶等就是其中主要的国家集团。在铁器文化的带动下,各国努力整备政治体制和制度文化,普及铁器农具、促

进深耕农业,使各个国家各自成为能够与中国大陆各代各国进行对等外交的强有力的海东国家。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朝鲜古代的部族国家与中国各个朝代曾经有过极其密切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据《尚书传》:“海东诸夷,武王克商皆通道焉。”后来中原大地历经春秋与战国时期,两国的交流日益加强,特别是战国后期七雄争霸,燕、赵、齐地的大批知识分子、商人、工匠和农民,通过陆路或海路“走之朝鲜”,将中国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带进了当时朝鲜各国。古朝鲜的历史变迁,与中原大地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其时两国间发生的频繁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以及人员往来和知识分子的活跃,都无疑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和媒介。古朝鲜政治中心不断东移的过程和汉四郡的盛衰,朝鲜半岛在走向三国鼎立过程中发生的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等,同时也是古代中朝两国在文化上深刻交媾的历史过程。即使是地理位置处于半岛南部的三韩各国,也并没有停止与发达的中国各地交流的历史脚步。一是三韩各国主动派人与中国的中原和东南地区交流,二是积极接受从中国各地漂移过来的流移民,并通过学习其先进的生产技术、重用他们中的有用人才等方式,来强化交流和自身发展。

第二节 上古神话的原始文化意蕴

一、檀君神话的多源文化意味

在人类古代社会中,宗教和文学联姻是极其普遍的事情。综观朝鲜古代神话、传说和歌谣,大都与古代的某种信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于宗教与神话的关系,德国学者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神话与仪式及宗教存在着相互解释的问题,仪式解释神话,所以应该去探讨神话的内涵,“我们就必须在原始宗教的仪式中,寻求对它的理解。既然原始宗教的基本仪式,是祭祀仪式,就必须在祭祀仪式中寻求对原始宗教的理解。”^①我们先不说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起码其中的一点多少反映了事实,那就是神话与宗教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在朝鲜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些作品与古代先民的图腾信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最早的宗教信仰之一,约发生于

^① [德]埃文斯·普里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18页。

氏族社会。在印第安语中,图腾(totemism)是“他的亲族”之意,这与亚洲人的祖先崇拜观念因子极其相似。我们在朝鲜古代的有关文献中,到处可以发现图腾信仰的事实或痕迹。古代朝鲜人相信,自己的氏族部落与某种动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关系,或其他特殊的联系,这种动物或无生物就成为了他们的图腾,充当着整个家族的保护神或某种象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观念在朝鲜先人那里被当作千真万确的“事实”传承下来,成为了重要的观念形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朝鲜上古时期的这种图腾崇拜观念与神话传说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其主人公或作品的中心意象。在神话中,这种图腾化身被神圣化,呼风唤雨,披荆斩棘,成为古代社会中家喻户晓的英雄。从各种文献记载中的迹象看,在朝鲜与图腾有关的神话并不少,但因种种原因,流传至今的数量极其有限。朝鲜历代广为流传的檀君神话,是一部非常古老的神话,其故事和人物形象蕴含着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高丽时期僧侣一然在《三国遗事》的《纪异》第一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檀君的神话。其曰:

其有桓因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神壇(檀)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壇树下,祝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壇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

这则神话从结构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前一段是有关檀君故事的前奏部分,主要渲染故事的谱系和氛围;中间一段则是故事的核心部分,主要讲檀君的诞生和创业;后一段是故事的结尾部分,主要交代檀君的建国和启后的过程。由于记录此神话的《三国遗事》作者一然是僧侣,神话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一然试图将朝鲜民族的人文始祖檀君描绘为佛祖的后裔,在它身上披上佛裔的光环,以此宣扬佛教的广大无边。这是我们研究这部神话的时候,应该格外留意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神话中的“昔有桓因”一句之后,加了一个“谓帝释也”的注解。“帝释”的梵语音译是“释迦提桓因陀罗”,它是

神话中须弥山上忉利天的王，是在喜见城统率四天王和十二天，保护佛法 and 皈依佛法的人，是征伐阿修罗军队的神。佛教称他是诸天之主。宋钱易《南部新书》曰：“释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号也。”在佛教神话中，“须弥山”处于四洲世界之中央，屹立于“金轮”之上，太阳也围绕这座山而转；传说此山顶为帝释天所处之所，四天王则居于此山山腰。至于“忉利天”，唐代僧侣惠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大方广佛华严经》之第十五《忉利天》中，对其有较详细的记录。又在佛教传说中，“忉利天”为欲界六天之第二天，在须弥山山顶，其中有“善见城”，是帝释天所居之处。从这些考察中可知，这则神话中的桓因就是印度佛教神话中的“帝释”，而“帝释”就是其须弥山上的忉利天天王。

经过仔细的考察和辨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然记录的这一则檀君神话，包蕴着三个神话系统：

一是如上所述的印度佛教神话系统，在作者那里，这是关注度较高的部分，也是倾注了一番艺术妙想的部分。作品中的桓雄是帝释桓因之子，他有意于天下世界，贪求人间生活。桓雄受父亲之命，带着天符印，率领三千人马，降于太白山顶神檀树下。桓雄下凡到的太白山神檀树附近谓之“神市”，他在此称“天王”，治理天下。这样，古老的朝鲜，自有国之初就成为了与佛氏有关的国度；作者想以此宣示朝鲜开国的神通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佛教传入东方各个国家以后，逐渐吸收其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加强自身的渗透力，最终实现扎根于其国其民的习俗和精神世界深处，这是通过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可以证明的事实；但是它渗入于其国其民的神话传说之中，蓄意改变其主题及其意象，还是很少见的东西。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古老的檀君神话，在其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怎样的歪曲和再加工。

二是这部神话还引入了中国风伯、雨师、云师等神话系统，试图以此来加强自己的艺术魅力，以博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和喜欢。作品讲述桓雄下凡人间世界之时，带领了三千之徒，以风伯、雨师、云师为首，“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这样，这则神话的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趋于完整化，画面更为立体生动，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中国，有关风神的崇拜起源很早，《周礼·大宗伯》说：“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风师，箕也。”具体来讲“月离于箕，风扬沙，故知风师其也”。东汉蔡邕《独断》则称，“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风伯”亦称“飞廉”，《楚辞·离骚》云：“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曰：“飞廉，风伯也。”中国古代流传过